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 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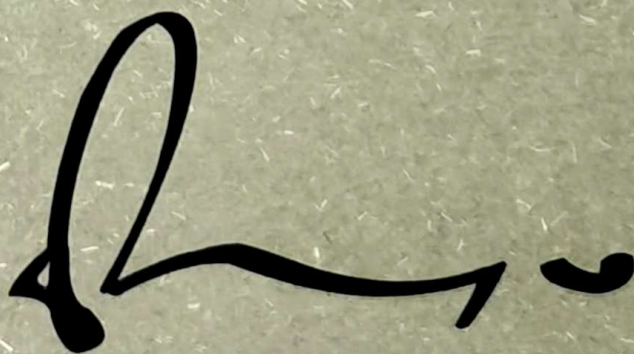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2020 年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前沿报告 *

祝铭

内容摘要：2020 年，在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事业取得了新的突破。本年度我们在青藏高原考古学与艺术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研究的时段、区域、角度覆盖较为全面。各项考古新发现和前沿研究强有力的证实了西藏自古以来与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事实，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这一年度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等相关研究工作做简要回顾，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趋势、新动态、新局势和新亮点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探讨。

2020 年 8 月 28 至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元 1-10 世纪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地带的文明联系研究”（18CKG018）的阶段成果。

交流交融。”

2020年9月28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2020年，青藏高原的考古与艺术事业取得了新的突破，各项考古新发现和前沿研究强有力地证实了西藏自古以来与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事实，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这一年度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等相关研究工作做简要回顾。

一、史前时期考古新趋势

本年度青藏高原史前时期考古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对若干重要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持续数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认识青藏高原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数据和资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公布了琼结县邦嘎遗址2015年的发掘简报，该遗址曾被认为是曲贡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¹，此次发掘的主体堆积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与曲贡文化存在较大差别。从出土陶器来看，邦嘎遗址主体堆积的年代应在曲贡晚期遗存之后，与曲贡晚期石室墓时代相当²。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曲贡遗址进行发掘，本次抢救性地发掘工作是对1991年发掘工作的补充，大量石器及发现的玉箭镞等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出土物，为曲贡文化及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发掘中采用多种科技手段，为重建该遗址的复杂生业形态奠定了基础³。

西藏考古中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最早由童恩正提出，以公元前1000年作为起始，结束于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大致包括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⁴。本年度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集中在西藏西部地区，主要是对几处墓地的连续性发掘。长期以来，

1 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63-76。

2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山南市文物局：《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2015年的发掘》，《考古》2020（1）：36-45。

3 资料来源：<http://www.silkroads.org.cn/portal.php?mod=view&aid=43938>，2021年5月30日。

4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9）：9-19。

整个西藏西部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材料十分匮乏、零散⁵，本年度的考古发现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对阿里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经过4个年度的发掘，该墓地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大致可分为：陶器、金银器、铜器、铁器、木器、料珠和纺织品等。结合出土遗物和测年数据，该墓地延续时间较长，上限可达公元前300年，下限至公元600年。该处墓地的发掘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⁶。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连续4年对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开展发掘工作，该墓地是迄今所知西部阿里最早的古代墓葬遗存，自距今3600年延续至距今2200年，是一处包含有建筑和墓地的综合性遗址，对于构建西藏史前区域考古学文化、探讨文化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⁷。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噶尔县门士乡觉莫林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地西南临近古入江寺和故如甲木墓地。墓地中发现有土洞墓和竖穴石框墓两种墓葬类型，丰富了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为认识象泉河流域上游及其周边地方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⁸。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继续在阿里札达皮央东嘎遗址群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连续三年共计试掘清理墓葬65座，新发现遗址10处。测年数据表明，65座墓葬中年代最早的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最晚的时间为16世纪。结合墓葬形制的变化、出土的数百件陶器，可建立这一遗址群1700余年的年代与典型器形态演变序列。这是西藏西部目前已知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探讨西藏西部墓葬的演变提供了最新的考古材料⁹。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革新，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相结合的新趋势。科技考古的运用推动了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研究的进步，本年度的科技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考古、石器考古和成分分析等领域。

唐莉介绍了邦嘎遗址的新的古植物数据，并将其与青藏高原其他高海拔考古遗址的

5 吕红亮：《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7。

6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札达县文物局：《西藏桑达隆果墓地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第008版。

7 资料来源：<http://www.silkroads.org.cn/portal.php?mod=view&aid=43939>，2021年4月30日。

8 资料来源：<http://www.silkroads.org.cn/portal.php?mod=view&aid=43939>，2021年4月30日。

9 资料来源：<http://tv.cctv.com/2021/05/04/VIDEQJyMKoWB7ikqfCJXz7Dz210504.shtml>，2021年5月4日。

大量数据进行了比较。认为由于生态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一种以青稞为主的专业化耕作模式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最终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一个大地理区域内被采用¹⁰。

韩芳介绍了参雄孕朔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并从制作的角度探讨了石制品技术对该地区狩猎采集者流动性的影响。结合石制品组合和年代序列，推测参雄孕朔遗址是一个狩猎采集者的石制品工坊，他们使用在现场附近发现的高质量硅质岩来生产细石器，主要是为了适应在高海拔地区的生存¹¹。

郜媛媛梳理了青藏高原先秦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藜属植物遗存，反映出该区域内早期居民生态资源拓展的多样性，为理解青藏高原的植物资源利用提供了直接证据¹²。

郜媛媛还梳理了有关青藏高原史前麦类作物起源与传播路径等的主要观点，认为麦类作物率先从青藏高原东西两端传入，其中东侧传入的麦类作物年代最早，以小麦为主；在高原西部地区，麦类作物多出现在墓葬当中，表明其特殊的仪式性内涵¹³。

任萌等对阿里曲踏墓地和加嘎子墓地可见残留物进行科技分析，证明曲踏墓地很可能存在青稞；加嘎子墓地的食物遗存当中包含大麦、小麦、小米和水稻等多种谷物的种子，体现了阿里地区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多样化的农牧业系统。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考察前吐蕃时期西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¹⁴。

除遗址和墓葬之外，青藏高原的岩画遗存也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余小洪等公布了西藏两处岩画地点的材料。一处是阿里札达县曲龙遗址的曲米色布岩画，该岩画是曲龙遗址首次发现的岩画点，其时代从公元前后延续至明清时期，是象泉河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曲龙遗址的考古遗存类型¹⁵。另一处是定结县的金龙普岩画，该岩画是定结县首次发现的岩画遗存，可分为早晚二期，早期是前吐蕃至吐蕃时期，晚期为元至近代，其风格可能与藏西、藏北地区有关。定结县金龙普岩画进一步丰富了西藏西南部的岩画遗存，为讨论吐蕃以前该地区与藏北、藏西的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

10 Li Tang, Hongliang Lu, Jixiang Song, et al., "The transition to a barley-dominant cultivation system in Tibet: First millennium BC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Bangg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20 (11): 1-11.

11 Fang Han, Yuanhong He, Wei Du, et al., "Technological strategy and mobility of Middle Holocene hunter-gatherers in the high-altitud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 case study from Tshem gzhung kha thog",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0 (12): 242.

12 郜媛媛:《西南地区先秦时期藜属植物利用的考古学观察》,《西藏大学学报》2020(2): 17-26。

13 郜媛媛:《青藏高原史前麦类作物的发现与研究》,《藏学学刊》第22辑,2020(1): 34-52。

14 任萌、杨益民、仝涛、李林辉、赤列次仁、吴妍:《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及加嘎子墓地可见残留物的分析》,《考古与文物》2020(3): 122-128。

15 余小洪、席琳:《西藏阿里札达县曲龙遗址曲米色布岩画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0(1): 97-103。

的资料¹⁶。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玉树曲麻莱县昂拉岩画的调查简报，其制作年代在距今 3000-2000 年之间，是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的”牧业文化遗存。该处岩画处于通天河沿岸岩画分布区的最西端，属高海拔地区的“青南高原岩画”，其内容展现了公元一千纪以降青南高原畜牧 / 游牧文化的诸种特征¹⁷。

张亚莎等对青海玉树白龙沟符号类岩画进行梳理与研究，认为这是一处以苯教文化内容表现为主的岩画遗址群，其图像内容相对原始，年代应早于藏西、藏北、玉树等同类题材的岩画图像¹⁸。

总的来看，本年度青藏高原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若干遗址、墓地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二是对藏西及青藏高原东麓几处岩画点的调查与研究；三是科技考古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目前来说，新的考古发现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一些重要发现的相关报告还未见刊布。这需要相关考古文物从业人员及有关部门加大投入，使这些重要的考古新资料早日公之于众。科技考古的运用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其中植物考古、石器考古、成分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人类骨骼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等在青藏高原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中均涉及较少。随着今后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与更多科技手段的引入，这一局面有望得到改善。

二、吐蕃时期考古新动态

本年度吐蕃考古最具瞩目的成绩是对几座高级别墓葬的发掘，这为我们了解吐蕃陵寝制度、丧葬习俗和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极大地改善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文献材料对吐蕃丧葬文化进行解读的研究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的发掘简报，该墓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已知的唯一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这座墓葬的封土结构、墓道朝向等特征与典型的吐蕃墓葬明显有别，可能体现了一种源自本土的丧葬传统。墓葬中的壁画、彩绘漆棺和暗格内放置的鎏金银冠等暗示墓主的身份等级较高，同时也体现出包括吐蕃、

16 余小洪、王蔚：《西藏定结县金龙普岩画调查与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0（6）：136-140。

17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昂拉岩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23 辑，2020（2）：1-31。

18 张亚莎、邹沁园：《玉树白龙沟岩画与苯教文化关系研究》，《中国藏学》2020（2）：75-83。

唐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¹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青海都兰热水“2018 血渭一号墓”进行发掘，该墓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目前墓葬已经出土金、银、铜、铁、漆木、皮革、玉石、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 1000 余件，其中一件吐蕃时期银质印章引起高度关注，印面古藏文汉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树木年轮测定墓葬的年代在 8 世纪中期左右（公元 744 ± 35）。结合敦煌吐蕃经卷的记载，推断墓主人可能是莫贺吐浑可汗²⁰。

霍巍撰文介绍了上述两座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并对其意义加以评述，认为透过两处墓地地面墓园布局、墓葬结构与形制、墓葬壁画、漆棺及出土鎏金银冠等方面，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为吐蕃时代考古与吐蕃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²¹。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当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 5 座较大的封土墓，封土平面大体呈近圆形或方形，立面均呈覆斗状。墓葬依形制可分为穹窿顶石室墓和竖穴土坑石室墓两大类。发掘出土器物约 300 件（套），其中出土的单耳平底带流罐和彩绘“赭面”人物陶片显示出明显的吐蕃时期文化特征，石围棋子、雄狮鸟纹金耳勺、纺织物等器物的出土也反映了吐蕃与唐朝等地的密切文化往来²²。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在山南浪卡子县那龙墓地发掘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此次发掘采取套箱法对墓葬整体打包提取，然后在室内清理，是西藏首次搬迁墓葬的尝试。测年结果显示该墓为 6 至 7 世纪吐蕃时期的遗存²³。这座墓葬现放置在山南市博物馆，与其一同展出的还有浪卡子县出土的一批金银器物，时代应早于吐蕃时期，其中包括银饼、萨珊银币和一件希腊风格的银盘，这些器物充分显示了青藏高原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互动。

除了对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本年度在器物研究领域也是成果丰硕，这些研究涉及到了吐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霍巍、祝铭对 20 世纪以来有关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经过国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8）：19-37。

20 资料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culture/2021-02/01/c_1127048246.htm，2021 年 2 月 1 日。

21 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6）：5-12。

22 资料来源：http://tibet.news.cn/ywjj/2021-04/19/c_139890277.htm，2021 年 4 月 19 日。

23 资料来源：<https://c.m.163.com/news/a/G90JEIR70512B07B.html>，2021 年 5 月 2 日。

内外学者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吐蕃金银器的考古文物资料已积累了相当数量，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开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若干不可回避的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引起学界更加广泛的关注²⁴。

周杨结合以往研究和相关材料，对这西藏拉萨大昭寺藏鎏金兽首银壶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通过对银壶的形制、纹饰及图像内容进一步研究，指出其应为吐蕃王朝后期西藏本土或邻近地区制造，时代可能是在9世纪以后，银壶结合了当时来自中亚、西亚吐蕃本土及中原唐朝等文化因素，反映出吐蕃后期金银器的制作风格²⁵。

李帅对印章在吐蕃社会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吐蕃社会曾广泛用印，并有官印与私印之分，其中官印普遍用于盟誓、诏令政策、司法、驿传、财税等官方活动，私印主要用于契约签订、纠纷处理、账目清册、书信等方面，吐蕃的用印习惯和印章文化影响深远，为藏族印章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²⁶。

夏吾卡先介绍了贡确松寺收藏的一口铜钟，这件铜钟是不丹王国境内目前仅见的吐蕃时期遗物，通过类型学分析和铭文释读，可以推测该铜钟铸于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其铸造与唐蕃文化交流有直接关系²⁷。

近年来在汉藏交界的青藏高原东麓地带相继发现了一批吐蕃时代的摩崖造像，这批材料以佛教摩崖造像为主，其中多处石刻附有藏文题记，对于佛教艺术、唐蕃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²⁸。

本年度在该领域的研究仍有一定突破。董华峰再次梳理了藏东地区发现的一批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认为这批造像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在9世纪初，出于唐蕃关系的需求，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吐蕃上层展开了策划周密、目的明确的造像活动；后一阶段在赤祖德赞时期，此时唐蕃和盟修好，造像已不再承担政治功能，转而进入宗教信仰的范畴。前后两个阶段的大日如来八大菩萨造像在技法、形式、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见证了9世纪前半叶唐蕃关系的变迁²⁹。

此外，学界也不乏对藏南、藏西地区吐蕃摩崖石刻的关注。阿贵等对洛扎县两处吐蕃摩崖石刻做进一步分析，认为石刻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即德麦·弟乌穷，是吐蕃牟尼赞

24 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0（2）：8-16。

25 周杨：《西藏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20（2）：80-85。

26 李帅：《论印章在吐蕃社会的使用》，《中国藏学》2019（2）：140-146。

27 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8）：104-109。

28 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3）：353-383。

29 董华峰：《唐蕃关系视野下的藏东大日如来八大菩萨造像》，《青海民族研究》2020（1）：171-177。

普时期的三大家臣之一，该石刻与不远处的杰堆古墓群存在密切关联，据推测墓群主墓墓主身份应是德麦·弟乌穷，周围的中小型墓葬应是其家族的其他成员墓葬³⁰。

夏吾卡先梳理了近百年来西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百余处古藏文摩崖题刻及其相关研究，这些题刻文献对与研究吐蕃时期的文化、交通、贸易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³¹。

考古学与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理论方法是青藏高原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一大特色³²。本年度先后发表多篇有关古藏文写卷、题刻的研究文章，为吐蕃考古与艺术研究增添了许多文献材料和关键证据。

陈践重新对百慈藏卷《吐蕃兵律》进行译释，认为兵律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关于吐蕃军队军法、军规、军纪的具体律条；二是涉及一些具体排兵布阵、阵法城守的律例。兵律内容显示其抄录时间在745年之后，与敦煌古藏文其他文献的年代相同，兵律产生的地点当在西域、甘肃、青海一带的汉地³³。

朱丽双重新对P.T.1089进行释读，此文书是敦煌所出最为重要的藏文官文书之一，其内容基本完整，为戊（狗）年十二月德论因沙洲官员对官秩品阶意见不一事颁发的批文副本，其中涉及到吐蕃统治时期沙洲及河西地区的部落建制、职官制度等问题³⁴。

谢后芳对P.T.1285号写卷中的藏文进行了校录，并对该文献加以译注，其中记载了本波为各小邦王禳灾的故事³⁵。

高莲芳、贡保扎西收集了一些较为完整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通过分类和比较，研究这些文书的内容、文体格式和语言风格。这些契约文书既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吐蕃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³⁶。

熊文彬首次介绍了一批在阿里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发现的吐蕃古藏文写卷，认为这批写卷应为吐蕃时期译入的佛经，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从桑耶寺等地请入，“这批写卷的发现，填补了阿里地区缺乏吐蕃时期文献的空白，对于吐蕃时期译本及其内容的研究，重新评价卫藏地区在阿里后弘期初上路弘法形成史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

30 阿贵、罗丝措：《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人物、地名及其相关问题》，《西藏大学学报》2021（1）：44-61。

31 夏吾卡先：《西喜马拉雅地区近百年来发现古藏文题刻研究述评》，《中国藏学》2019（4）：72-80。

32 杨清凡：《21世纪以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及研究回顾》，《中国藏学》2018（3）：188-194。

33 陈践：《百慈藏卷〈吐蕃兵律〉新译》，《中国藏学》2020（S0）：122-133。

34 朱丽双：《吐蕃统治时期沙洲官员的官秩品阶问题——P.T.1089释读》，《中国藏学》2020（4）：169-183。

35 谢后芳：《P.T.1285号“本波为各小邦王禳灾的故事”译释》，《中国藏学》2020（S0）：134-147。

36 高莲芳、贡保扎西：《论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结构格式与语言风格》，《西藏大学学报》2020（2）：97-107。

要的学术价值。”³⁷

林冠群透过现存的吐蕃碑铭与《贤者喜宴》所录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及与誓官员名录的比较，分析认为此二文献为作者亲见原件并忠实抄录，该文献有助于我们看清吐蕃王室对于佛教的认识以及当时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发展程度³⁸。

总的来看，本年度有关吐蕃时期的考古与艺术研究主要是针对墓葬、器物、摩崖石刻、藏文写卷等的专题研究，研究内容包含吐蕃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丧葬等，几乎涵盖了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几座高级别大型吐蕃墓的发掘尤为重要，填补了以往文献记载的空白。“2018 血渭一号大墓”出土的银质印章表明，墓主人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位吐谷浑王族。这为我们重新考量青海地区吐蕃墓葬的族属提供了新的线索，一些兼具吐蕃、唐朝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墓葬很可能与这一时期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有关。敦煌古藏文写卷涉及吐蕃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以往对这些文献材料的关注主要局限于历史学、文献学及语言学界，并未引起考古从业者足够的重视。自褚俊杰释读 P.T.1042 后³⁹，考古学界开始频繁使用当中记载的苯教丧葬仪轨来解读考古现象。古藏文写卷的释读工作可与汉文史籍互相补充，文献材料与考古遗存的有机结合，是正确认识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三、宋元时期考古与艺术研究新局面

宋元时期西藏高原的遗存主要包括石窟、寺院、佛塔等各类建筑遗存和雕塑、绘画和经书等遗物，随着资料的公布，本年度宋元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上述佛教遗存开展的专题研究。

夏吾卡先对西藏林周县强康大殿废墟中的石雕造像和碑刻进行研究，认为石刻的年代在公元 11 世纪中后期，造像风格受到东印度帕拉王朝的影响，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西藏中部地区与东印度帕拉王朝文化交流的产物⁴⁰。

赵刚等对日喀则岗巴县新发现的多尔玛石窟进行调查，认为其造像方式、题材及绘

37 熊文彬：《西藏札达皮央杜康大殿发现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及其初步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21（1）：9-14。

38 林冠群：《两件吐蕃赞普弘佛盟誓诏书史料价值之探讨》，《中国藏学》2021（1）：107-117。

39 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 P.T.1042 解读》，《中国藏学》1989（3）：15-34。

40 夏吾卡先：《西藏林周县杰拉康帕拉风格石雕造像与碑刻的调查研究》，《藏学学刊》第 22 辑，2020（2）：81-99。

画风格等与恰姆石窟年代接近，应为 11-12 世纪，该石窟的发现对研究宋元时期西藏的石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⁴¹。

王瑞雷对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新发现的佛塔壁画及出土文字材料进行研究，认为该佛塔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初大译师仁钦桑布父系家族，即舒韦尔家族于 10 世纪早期所建的供养塔。佛塔壁画题材为三世佛、八大菩萨、十二护方天及四大天王，其整体图像反映了消灾救度的主题。卡孜河谷佛塔壁画和官方文书的发现，对于认识 10 世纪前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对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乃至文化制度层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⁴²。

多吉平措对布达拉官法王洞进行考察，认为该殿堂的建筑及殿内的法王造像和壁画等均为 14 世纪左右的艺术遗存，并非传统上人们认为的吐蕃时期的遗迹⁴³。

贾玉平对西藏夏鲁寺大回廊“猕猴王本生”壁画进行研究，认为其中明显可见汉、藏和尼、印等不同民族的风俗⁴⁴。

廖旸以星耀佛母为中心对 11 至 15 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进行考察，认为星耀佛母发端于印度文化，作为陀罗尼的人格化在密宗兴盛的时代得到佛教的认可，从而作为佛教神系并传入我国，其创造与改造的历程是当时神系演化的一个缩影⁴⁵。

王传播对藏式过街塔进行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结合汉、藏文文献及图像讨论过街塔的缘起、宗教功能等，认为后世流传过程中对塔名的异写、误读与附会，反映了过街塔已偏离最初所指的阿闍佛信仰⁴⁶。

综合来看，目前宋元时期西藏考古和艺术的重点还是资料的公布和图像的基础研究，仍处于研究工作的基础阶段。目前西藏发现有大量石窟、寺庙等，其中已公开发表的石窟遗存有三十余处，散见于各相关题材的研究文章中。近几年，陆续有学者前往西藏进行石窟调查，但是相关资料还未见公布。究其原因，一方面部分学者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不具备撰写专业调查简报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西藏石窟中的图像以曼荼罗题材为主，这需要调查人员具备相关密教图像辨识和识读藏文等能力，否则无法对题材进

41 赵刚、赤培·巴桑次仁：《西藏日喀则岗巴县多尔玛石窟的初步调查与研究》，《西藏研究》2020（3）：151-156。

42 王瑞雷：《西藏阿里卡孜河谷 10 世纪佛塔供养人题记与壁画研究——兼论吐蕃时期卫藏及敦煌早期的关联》，《文艺研究》2020（2）：124-137。

43 多吉平措：《布达拉官法王洞建筑演变及艺术风格考察》，《藏学学刊》第 22 辑，2020（2）：175-191。

44 贾玉平：《西藏夏鲁寺大回廊“猕猴王本生”壁画图像再现》，《西藏研究》2020（6）：124-129。

45 廖旸：《11-15 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三）——以星耀佛母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2）：33-47。

46 王传播：《藏式过街塔名称意蕴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4）：141-149。

行准确辨认，为资料的公布带来一定的困难。

当前对石窟中图像的研究偏向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尊像进行识读，并将其与藏文本进行对照，力图找到相对应的文本，依次讨论文本、译者的相关背景。这一程度上对于考察图像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针对单个图像，忽视了其与周围图像的配置关系，而且文本也未与图像完全对应。如何把握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做好图像的释读工作后，如何将图像资料置于宋元时期大的历史背景下探讨问题，是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把握的重点。

四、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与汉藏交流研究新亮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发现和西藏艺术研究在并驾齐驱中取得了长足进步。相较于历史时期的西藏考古，历史时期的西藏艺术研究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经济的繁荣与大量传世文物的涌现，社会对西藏艺术品关注度的持续提高，加之藏汉研究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大的飞跃⁴⁷。本年度明清时期西藏考古艺术研究在这次“飞跃”中也硕果累累，按研究对象可分为图像与文本研究、涉藏文物研究和藏传佛教石刻研究。

图像研究是近年藏传佛教研究的重要领域，本年度在壁画断代、考释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

熊文彬等对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寺旧殿内转经道的早期壁画进行研究，该壁画系曼塘派和钦孜派早期的重要遗存之一，出自两派的创建者及其早期传人之手，对于厘清和重构这两个画派的早期艺术面貌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⁴⁸。

张昆晟对拉萨乃琼寺回廊壁画进行研究，乃琼寺是建成于17世纪的哲蚌寺的附属建筑，具有浓厚的宁玛派色彩。文章认为该寺回廊壁画呈现出主祀护法神贝哈尔王为主的神灵世界，壁画的内容取材源自五世达赖喇嘛本人十分偏好或与之亲善的伏藏师所取出的伏藏法门⁴⁹。

罗文华对扎什伦布寺的绘画风格进行考察，认为其绘画风格可明显分为两段，即15世纪和17至19世纪，两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特点。该寺的壁画和唐卡作品填补了

47 谢继胜：《近七十年西藏艺术研究的进展》，《中国藏学》2020（1）：11-20。

48 熊文彬、李凯、卢素文：《图像与文本：西藏当雄县羊八井寺早期壁画遗存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3）：47-56。

49 张昆晟：《乃琼寺回廊壁画所呈现的藏传佛教护法神体系》，《藏学学刊》第22辑，2020（2）：299-327。

拉堆风格与年堆风格关系研究上的空白，对我们认识后藏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⁵⁰。

闫雪对拉孜县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内保存完好的17世纪初壁画进行研究，认为该壁画集中描绘了“如来藏十经”和“了义十经”为代表的显宗经典题材，这在西藏寺院壁画中较为罕见⁵¹。

伯果对瞿县寺瞿县殿两铺壁画中的六位上师身份进行考证，结合造像特征和汉藏文献史料，认为壁画中出现的人物分别是两位萨迦派祖师萨班·贡嘎坚赞、八思巴和四位瞿县寺早期住持⁵²。

王露、罗文华对阿里札达县皮央石窟Ⅳ区32窟护法殿壁画进行考察，认为此窟壁画以萨迦派宝帐护法为主题，其绘制年代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之间，具有藏中地区的艺术风格，反映出萨迦派在西藏西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⁵³。

泽仁曲措对阿坝马尔康甲扎尔甲洞窟壁画进行研究，认为壁画内容为藏传佛教题材，创作时间大约为明清时期⁵⁴。由于壁画保存状况较差，文中未对壁画风格所属派系等问题作进一步考述。

杨旦春对甘肃妙音寺多吉祥强殿曼荼罗图像进行研究，认为该图像历史悠久，内容全面，保存了自明代早期以来一百多幅曼荼罗作品，在内容上几乎涵盖了藏传佛教曼荼罗常见的大部分题材，不仅代表了当时以大通河、庄浪河流域为主的“华锐”地区密宗文化特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明代以来藏传佛教密宗曼荼罗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⁵⁵。

除了对石窟壁画的讨论，本年度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对于清宫藏唐卡等文物的研究，尤其是对清朝皇帝个人宗教偏好的考察。

刘舜强等梳理了清代宫廷唐卡的研究现状，将目前学界对于清宫唐卡的研究分为三类，即图像学与宗教学研究、绘画流派与绘画技法研究、制作技艺与保护修复研究⁵⁶。

文明等对清宫佛日楼挂供的一组罗汉组合唐卡进行研究，认为该组唐卡绘制完成的

50 罗文华：《15-19世纪扎什伦布寺绘画风格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1）：20-34。

51 闫雪：《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如来藏十经”壁画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2）：48-58。

52 伯果：《瞿县寺瞿县殿上师壁画人物身份考述》，《青海民族研究》2020（4）：161-165。

53 王露、罗文华：《西藏阿里地区皮央石窟护法殿壁画考察报告》（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12）：89-102。王露、罗文华：《西藏阿里地区皮央石窟护法殿壁画考察报告》（下），《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93-106。

54 泽仁曲措：《嘉绒“甲扎尔甲”山窟壁画遗存分析》，《西藏艺术研究》2020（4）：28-33。

55 杨旦春：《甘肃妙音寺多吉祥强殿曼荼罗图像内容及其布局考述》，《西藏大学学报》2020（1）：88-96。

56 刘舜强、张迪：《清代宫廷唐卡研究综述》，《西藏艺术研究》2020（2）：35-40。

时间大约为乾隆四十年（1775），是典型的清宫风格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对于研究清皇室的宗教信仰、汉藏佛教的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⁵⁷。

张长虹关注到清宫唐卡上十八罗汉题名与背面白绫签不符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对汉藏罗汉名号与座次的考证，认为该题材图像的差异反映了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汉地自宋代发展出十八罗汉，但最后两位罗汉的身份不固定，自元以降，多以降龙、伏虎为十八罗汉组合中的最后两位。藏地则以达摩多罗和和尚、布袋和尚加入十六罗汉，构成固定模式⁵⁸。

孔令伟通过考察大黑天金像、清帝佛装唐卡和右旋白海螺，探讨清朝皇帝的宗教实践与政教观念。认为清朝皇帝的宗教实践主要是受到佛教宇宙观以及知识体系的影响，而非安抚蒙藏地区的政治宣传，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在构建政教话语的同时亦深受佛教知识论的影响⁵⁹。

王跃工等结合汉藏史料、清宫档案和现存实物，探讨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前宫廷与扎什伦布寺在艺术、宗教领域的频繁互动。并以此揭示了此间汉藏交流更为全面真实的面貌，为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年代明确的依据⁶⁰。

方小济对故宫藏三轴弘历佛装像唐卡进行比较研究，主要讨论了唐卡的绘制材料与工艺⁶¹。

刘舜强等从《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案》出发，考察了清代宫廷唐卡镶做机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对我们认识清代宫廷手工业的发展和藏传佛教文化在清宫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⁶²。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印章、石刻等涉及汉藏交流的文物与遗存。例如，马骥越以清宫所藏三件六世班禅进献的外国文物为中心，梳理了礼物的来源、进献的时间及背景，以及乾隆皇帝收到礼物后的改造、仿制与供奉。认为三件礼物进献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二十七日，与六世班禅当日的传法活动有关，很可能是通过东印

57 文明、张长虹：《清宫佛日楼挂供十八罗汉组合唐卡研究》，《中国藏学》2020（S0）：16-32。

58 张长虹：《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汉藏罗汉名号与座次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6）：24-39。

59 孔令伟：《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与乾隆帝的宗教心态》，《藏学学刊》第22辑，2020（2）：328-341。

60 王跃工、马晟楠：《人似秋鸿来有信——六世班禅东行前乾隆宫廷与扎什伦布寺交往之实物与史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1）：4-19。

61 方小济：《故宫藏弘历佛装像唐卡研究》，《西藏艺术研究》2020（3）：36-42。

62 刘舜强、张迪：《从造办处活计档看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唐卡镶做机构的形成与发展》，《西藏大学学报》2020（1）：81-87。

度公司订购于印度⁶³。

朱德涛对 15 枚清朝西藏地方上使用过的汉字官印进行考证和分析,认为这些官印主要有明朝政府颁赐的旧印和清朝地方自制印两种来源类型,对这些汉字官印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和了解清初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政治制度与特点,意义重大⁶⁴。他还对颇罗鼐的用印情况进行考察,认为这些印章可分为清廷封授印和西藏地方自制印两大体系,前者的使用场合和等级要高于后者⁶⁵。

罗勇对吉隆县宗喀镇至吉隆镇公路左侧峡谷内的“招提壁垒”石刻题铭进行解析,认为“招提壁垒”意为具有佛教寺庙内涵的堡垒,由此断定该石刻题铭是清代乾隆年间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过程中或其后不久由清朝官兵或驻藏大臣留下的石刻题铭⁶⁶。

索德浩对四川成都高新区中和镇龙灯山墓地中的藏传佛教石刻进行研究,该墓地为明代蜀王府将军的家族墓。其中 M1 墓顶刻有两幅曼荼罗图像,一幅中央为观音种子字,周围围绕六字真言;另一幅中间为一梵文“唵”种子字。其文特征和图像风格均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风格,显示出藏传佛教对成都地区的影响⁶⁷。

近两年还出版两部有关明代汉藏交流史研究的力作。熊文彬的《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是第一部研究明代西藏与内地艺术交流的专著。该书在明代中央政府对藏区治理的大背景下,对明代北京、南京、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和内蒙古现存藏传佛教代表性艺术遗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梳理、归纳、总结出这些遗迹的历史、题材和风格特点及其反映的西藏与内地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史实⁶⁸。本书对于西藏艺术史的构建、明代汉藏文化的交流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李帅的《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域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结合实物材料和汉藏文献材料,从文物考古视角对明朝经略西藏进行综合研究,将明朝的治藏策略概括为“以文治边”策略,即主要通过制度、物质及思想观念等“文化”策略来影响和牵引西藏形成对明朝的认同和归属。首次提出明朝以“文”治藏策略是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治理中的“西藏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明代汉藏关系始终保持了和平发展,而且成功地

63 马骥越:《清宫所藏三件六世班禅进献的外国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11):35-45。

64 朱德涛:《清朝前期西藏所用汉字官印及其相关问题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3):20-28。

65 朱德涛:《颇罗鼐封号和用印考实》,《西藏研究》2020(3):87-96。

66 罗勇:《吉隆沟“招提壁垒”石刻题名解析》,《西藏研究》2020(5):57-60。

67 索德浩、王梦雨、左志强:《成都地区新见明墓中的藏传佛教石刻初探》,《藏学学刊》第22辑,2020(2):100-118。

68 熊文彬:《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

使元朝与西藏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得到延续，并为清代治藏奠定了历史基础⁶⁹。

这两部专著在研究明朝汉藏考古文物的同时，充分利用明朝汉藏交流的文献史料，双向考察了明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及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考古艺术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

综上，在研究材料和内容上，本年度藏传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关注的范围已经不限于西藏地区，开始涉及藏传佛教传播的区域，如成都地区。这些带有明确年代标尺的考古材料也是历史时期西藏艺术的直接研究对象。

本年度学界对于涉藏宫廷文物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且更加注重考察最高统治者对藏传佛教艺术的个人偏好。其中对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和清官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已蔚然成风。在研究方法上，同时关照文本与图像，将汉藏满蒙等多语言文献结合起来研究的论著日益常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多语言、多方位的考察也使得历史时期的西藏艺术研究不再只满足于对艺术本身的鉴赏，还要“以物见人”。并且，在对涉及到明清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文物进行分析时，也开始不再只单方面从中央审视地方，而是通过交往互动的视角进行双向考察。

西藏经元朝的管辖与治理，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快速发展。明清治藏与元朝先后承继，进一步推动了西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藏传佛教建筑、碑刻、造像、唐卡及壁画等精品层出不穷，不仅是西藏各民族的智慧与审美情趣的结晶，更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周边地区文化多元交流与融合的见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核心的是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根系，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各民族紧密相拥的内在、永恒的力量⁷⁰。明清时期的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密不可分，对于探索中华民族共同的根系，从方法论上深入中国历史本身重大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

五、高原丝绸之路研究持续升温

“高原丝绸之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包括“吐蕃丝路”“唐蕃古道”“香料之路”“食盐之路”“麝香之路”“茶马古道”等概念，但

69 李帅：《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域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70 霍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古学贡献》，《历史研究》2021（1）：53-60。

又不完全等同⁷¹。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青藏高原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与外界发生各种形式的交往，至唐代吐蕃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通干线和路网⁷²。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持续升温，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使得高原丝绸之路这一复杂的交通网络愈发清晰和丰满。

边雄·达瓦琼达结合古藏文史料和尼泊尔古碑文等原始资料对吐蕃时期的蕃尼古道进行分析，认为该古道在松赞干布之后具有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通道的功能，这些功能折射出了蕃尼古道丰富的文化内涵⁷³。

沈琛结合伊斯兰史料、汉藏史料和考古发现，对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向中亚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麝香，故可称为“麝香之路”。吐蕃与中亚的贸易路线包括海上和路上两条，这些路线交联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吐蕃与印度、中亚之间独特的贸易网络⁷⁴。

妥超群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重新进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青藏高原上的多弥、苏毗、白兰等王国地望进行考察⁷⁵。

仝涛对高原丝绸之路东段的路线及沿线古国的风俗进行考察，认为在王玄策的官方使团凿通“东道”之前，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是通过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连接，“东道”开通之后成为贯通高原南北、连接中原与印度的主动脉⁷⁶。

霍巍对宋代僧人继业西行归国的路线进行考证，认为继业归国的路线利用了唐初开通的经过西藏西南的“吉隆道”，途经桑耶寺，然后进入汉地中原，最后抵达峨眉山，从中反映出汉藏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汉唐高原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重要历史见证⁷⁷。

熊文彬对宋元至明清时期蕃尼古道的历史作用进行考察，认为该道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中尼两国交流的重要通道，其线路和站点从宋代以来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清代形成一

71 霍巍：《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1）：5-14。

72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11）：19-24。

73 边雄·达瓦琼达：《论吐蕃时期蕃尼古道文化内涵》，《西藏大学学报》2021（1）：50-61。

74 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中国藏学》2020（1）：49-59。

75 妥超群：《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西藏大学学报》2021（1）：21-35。

76 仝涛：《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时代背景与考古新证》，《中华文化论坛》2020（6）：13-23。

77 霍巍：《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经“吉隆道”考》，《史学月刊》2020（8）：25-31。

个主辅路并存错综复杂的网络，自元代开始承担起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中尼两国官方交流的重任⁷⁸。

“高原丝绸之路”历经史前、吐蕃、宋、元、明、清数千年经久不衰，直到现在也基本维系了其主要的干道与走向，是以汉藏两民族为主体，各时期、多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在“一带一路”国际视野下的今天，正确认识“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深入考察其线路网络，对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2020年度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研究的动态，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针对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研究特点。史前时段多学科参与考古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方法与手段逐渐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使得青藏高原史前考古迸发出新的活力。到了吐蕃时期，以汉藏史籍为主的多种文献与考古出土的新材料相互印证成为主流的学术研究方法，随着“高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和愈发完善，更多的学者开始将吐蕃王朝置于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进行考量，使得这一时段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宋元至明清时期，有关青藏高原的文物、遗迹和史料更加丰富，相应的研究也更加细致和深入，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汉藏交流和藏传佛教开展。

本年度我们在青藏高原考古学与艺术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研究的时段、区域、角度覆盖较为全面。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青藏高原考古与艺术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发展阶段，为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附记：本报告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主持，先后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祝铭、卢素文、杨天雪参与编写工作，最后由祝铭执笔撰写，霍巍教授修改定稿。

◆ 祝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78 熊文彬：《蕃尼古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国藏学》2020（1）：38-48。